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的历史道路



● 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國
的

中國

革命

紀念

部編

40周年紀念

革命委員會
路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

责任编辑：徐日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97,000

印数：1——18050

平装： ISBN7—217—00220—6/K·12

统一书号：11109·410 定价：2.05元

简易精装： ISBN7—217—00221—4/K·13

统一书号：11109·410 定价：2.50元

新书目：8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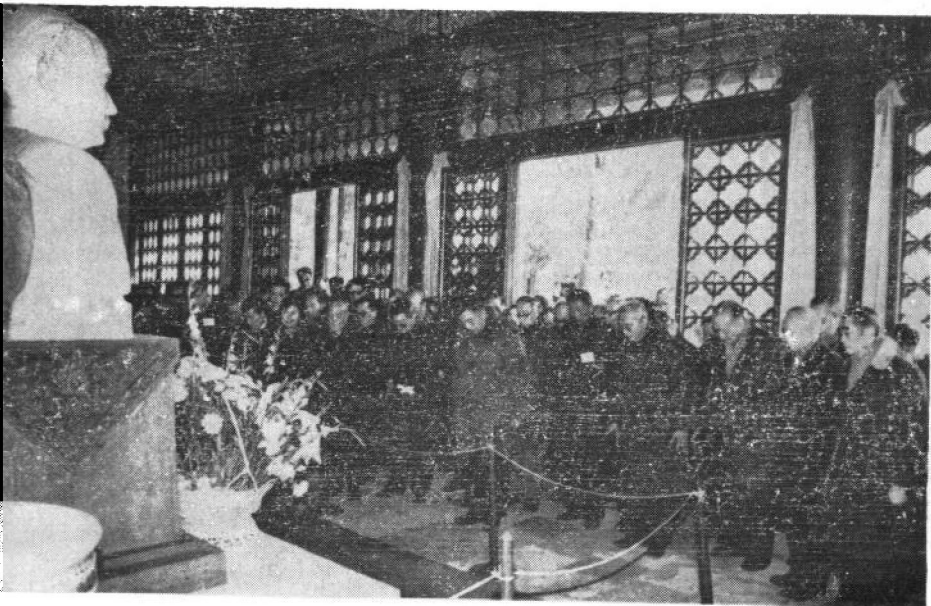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图为当时民革领导人合影。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1957年3月）。



196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致贺词后同毛泽东主席亲切握手。



1984年12月，民革中央领导人和参加民革全国工作经验交流会的各地代表前往香山碧云寺晋谒孙中山纪念堂。



1984年夏，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同屈武亲切握手。



1987年2月，民革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大会会场。

出版说明

1988年元旦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民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值此纪念民革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编辑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一书，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包括介绍民革历史的专文、民革中央大事记、重要历史文献和附录四个部分。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所限，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特别是民革中央大事记，仅反映了民革中央工作和活动的一个轮廓，十分粗略。我们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教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补充。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民革中央机关不少同志热心提供资料，帮助审阅稿件，最后承蒙湖南人民出版社大力协助，才得以出版。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1987年6月

目 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	(1)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左派	(1)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进一步分化	(4)
抗战时期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集结	(8)
民联、民促的成立及其活动	(12)
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民革的成立	(16)
民革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21)
建国初期民革工作的发展	(27)
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民革继续前进	(32)
整风反右运动前后的民革	(36)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民革	(42)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民革	(5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大事记	(71)
重要历史文献	(17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 (1948年1月1日)	(17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	
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1948年6月25日)	(186)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 (1949年11月14日)	(190)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宣言 (1949年11月16日)	(197)

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在民革五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1979年10月11日)

.....朱蕴山(20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词(1983年12月21日).....(214)

团结奋斗，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在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1983年12月21日).....屈武(218)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程(1983年12月27日).....(227)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87年2月8日).....王震(236)

高举爱国旗帜，团结奋斗，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

力量——在民革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1987年2月8日)

.....朱学范(239)

附 录

(一) 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简介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251)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256)

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260)

(二) 民革主要创始人小传

李济.....(261)

何香凝.....(263)

冯玉祥.....(264)

谭平山.....(266)

蔡廷锴.....(268)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继承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的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1948年1月建立的一个民主党派。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民革已经发展成为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三大历史任务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革是我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在民主革命时期孕育、产生，在社会主义时期成长、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史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左派

民革的孕育过程，也就是随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爱国民主力量逐步集结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二十年代初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继续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屡遭失败。

我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从此，我国进入了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他决心“以俄为师”，走扶助工农群众，联合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伟大的转变，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抛弃了某些过时的观念，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革命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样，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由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革命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赢得了东征讨伐陈炯明的胜利，并于1926年开始了北伐战争。

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党进行改组的过程中，由于对待三大革命政策的态度不同，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野。以廖仲恺、

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主张，真心诚意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势力。右派则持相反态度，反对或不执行三大政策，并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8月，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国民党左派在共产党帮助下，给右派以坚决打击。但是，右派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最终导致这次革命功败垂成。

1927年，当北伐战争胜利地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工农运动领袖、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

在这危急关头，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坚持三大政策的光荣传统，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927年发生“四·一二”政变以后，宋庆龄和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发表讨蒋通电。为了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宋庆龄宣布退出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她还多次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并且号召一切忠于孙中山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国民党人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八一”武装起义，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等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此后，国民党左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独裁的政策，并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是最早的国民党民主派，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和革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是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核心。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进一步分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武装侵略，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侵略者的炮火，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遭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加速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分裂。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不断发表言论，揭露和谴责国民党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行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动员各界同胞，抗日救国。

同时，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包括一部分实力派，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不满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奋起抗日。1931年，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在黑龙江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领导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和上海人民一起，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1933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抗击日本侵略军。这些爱国正义行动，虽然最后都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破坏，但是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获得了全世界进步舆论的赞扬，也推动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发展。

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方面的抗日反蒋力量的一次重大集结和联合斗争。这一年的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联合李济深、冯玉祥、陈友仁、李章达以及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人，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

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发表宣言，号召“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并同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协定，联合抗日反蒋。这次斗争最后虽告失败。但是，它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爱国民主力量开始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同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外部对抗，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在这期间，宋庆龄、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给政治犯以法律保障，并争取出版、言论、结社等民主权利。宋庆龄指出，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杀害和囚禁的革命者都是中国人民的精华，号召民权保障同盟必须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暴行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同盟的组织，得到著名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蔡元培、杨杏佛、史量才等人的赞同和参加。杨杏佛担任同盟的总干事，积极进行活动，于1933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多方面支持同盟的活动，也于1934年11月被杀害。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的响应，于右任、孙科等也表示赞同。同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在香港着手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任主席（蒋光鼐、蔡廷锴先后代理），开展秘密活动，办有《民族战线》、《大众报》、《大众动向》等

报刊，宣传反蒋抗日。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普遍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5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华北，同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对这次运动也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一二·九”运动的推动、影响下，各界人民先后成立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5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各地救亡团体，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十五人为常务委员。一些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制造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震动，群情愤慨，纷纷声援。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二十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也联名致电蒋介石，主张“慎重处理”。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等人还亲赴苏州，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由于舆论的压力、群众的声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12月将“七君子”释放。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绥远率部奋起抗日，收复百灵庙等地，给来犯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同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在西安扣押了前来部

署“剿共”的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释放上海救国会爱国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政治自由，遵行孙中山遗嘱，召开救国会议。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12月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企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结束了历时十年的内战局面，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实践停止内战、国共谈判、团结抗日的诺言。在会上，宋庆龄发表了题为《实现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严厉斥责了亲日派汪精卫的卖国谬论，批驳了“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方针，坚决主张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抗日力量。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了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国民党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也要求抗日和民主，四川刘湘呼吁“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论，发扬民主”，并联合广西李宗仁等提出了救亡方案。经过激烈的斗争，会议终于通过了宣言和决议，宣布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国共两党进行谈判。

1937年7月，在国共两党多次谈判的基础上，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9月22日，经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发表的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